

## ■ 纪念

# 鲍·瓦西里耶夫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 彭龄章谊



从报上看到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病逝的消息，鲍·瓦西里耶夫是谁？名字似很生疏。待得知他就是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时，相关的记忆像擦着的火柴“呼”地燃起，久久不能平息……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有些作家因为职务或其原因名气很大，但熟知他们作品的人却不多；而有的作品广为读者称道，却很少有人记得它的作者。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如此。特别是由它改编的电影，曾感动了无数观众，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我们的感受，1987年，瓦西里耶夫来我国访问，翻译家高莽陪他游览长城，对他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可以随意问问游人，他们都会证实这一点，但瓦西里耶夫不好意思开口。自长城返回的路上，他们在一家餐馆用午餐时，瓦西里耶夫忍不住悄悄对高莽说，他想问问女服务员有没有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高莽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当女服务员得知在座的这位外宾就是那部影片的原作者时，立即情不自禁地说：“看过，看过，看了两遍呢！”她为影片中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兵舍生忘死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只顾述说，连高莽这位“高翻”都来不及翻译。瓦西里耶夫拍拍高莽的手说，“无须翻译，我听懂了……”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也湿润了……

那位女服务员是幸运的。当时这部电影正在全国热映，不少观众像她一样，一遍不够，特意看两遍、三遍……而我们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那时，电影院公映的片子，除了“样板戏”之外，就只有许多观众都能把影片中的对白倒背如流的“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然而，在北京地质礼堂等处，却时不时放映一些所谓“供内部观摩与批判”的影片。那时，前苏联被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便是作为批判“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需要——既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又鼓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毒草”，用来“观摩”与“批判”的。这种荒唐事，恐怕是那位女服务员和今天的读者与观众们，难以想见的……

鲍·瓦西里耶夫1924年5月21日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自幼受部队生活熏陶，喜读军史，曾想将来做个历史学家。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德国法西斯入侵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他，志愿参军上前线。1943年因负伤撤回后方治疗，伤愈

后考入装甲兵学院，担任过军事工程师。1956年退役后进入剧作家包戈廷办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毕业后，在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并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创作的题材相当广泛，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军官》《我的祖国，俄罗斯》，也有卫国战争题材的《伊万诺夫快艇》《遭遇战》，还有历史题材的《虚实往事》等。1969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与后来的《未列入名册》(1974年)、《后来发生的战争》(1986年)被誉为他的战争题材“三部曲”。

苏联卫国战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前苏联作家们创作的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不下百部。而较之前辈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男人》、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在战火倥偬中写就的纪实性的急就章式的著作来，鲍·瓦西里耶夫1969年创作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和它差不多同期的邦达列夫的《热雪》、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作品，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也由于作家们有更充沛的时间、精力，从更深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重新回顾与审视了那场战争，创作手法上也更从容、更自由、更少程式化约束，因而无论思想性与艺术性，较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自然更胜一筹。这部作品部分取材于作者的经历，但他却特意将主人公换成了群尚不谙世事，却对未来充满向往与期盼，又突然间被卷入战争的年轻女兵，为的就是更具真更真实地表现战争给人类，特别是给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它虽不是《生者与死者》那样场面恢弘的全景式的“大制作”，而正因为它短小、凝练，反映的内容也更集中、更人性化。作者长于话剧与电影脚本创作，他的小说也明显带有戏剧与电影的特色：语言简洁，情节紧凑，结构严谨。加上娴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以小示大，立意高远，酣畅淋漓，不蔓不枝地将卫国战争中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呈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小说后面，那个令读者观众们称道的“尾声”，也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艺术特色：多少年后的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一位名叫阿尔培特·菲道特·叶甫格拉费奇·华斯珂夫——一个白发苍苍、粗壮墩实、只有一只手臂的老人，带着大理石墓碑，乘着小艇来到这里。老人凭着当年他做的记号找到了那座坟莹，人们才知道发生在这静悄悄的密林中那个凄婉感人的故事……

这部小说发表，正值我国“文革”期间，依据那时

奉行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赞赏的作品，自然要痛加否定。由它改编的电影，也只能作为“毒草”，供“内部观摩与批判”。但对有幸能搞到这种“观摩”票的观众来说，却在那个全禁闭的时代，从那被撕开的缝隙中，得以窥视外边的世界，倒是难得的幸事。至于他们是否认真去“批判”，却是另一回事。父亲曹靖华一生从事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教学，“文革”一来，他与苏联文学界的联系全被中断。当我们得知有这样一部苏联新拍的影片放映，便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票，让父亲有机会去“观摩”。记得他看后和我们谈起时愤慨地说：“卫国战争时，正是苏联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前方后方，流血牺牲，才打败希特勒，赢得胜利的……这么好的影片，竟然被说成什么‘既鼓吹军国主义，又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的双料毒草’，荒唐不荒唐！”

“四人帮”垮台后，“文革”中许多被迫停刊的文学刊物纷纷筹划复刊，《世界文学》酝酿复刊计划时，有人提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放映后反映强烈，不少观众渴望读到小说译文，《世界文学》复刊，应优先满足这一愿望。但又担心“拿不准”，万一有人又“打棍子”，不仅影响复刊计划，也会危及译者。商议中，终于想出“变通”的办法：在刊出小说译稿的同时，刊发一篇由译者参照以往批判文章的口吻写的“批判文章”，这样既可应付审查，又保护了译者。后来复刊的1977年《世界文学》第一、二期，既刊登了刘白羽、冯牧、罗大冈、王朝闻、季羡林与父亲等人批判“四人帮”的笔谈，也全文刊出了这部小说的译文和译者王金陵的“批判”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本终于得以在我国正式出版，由它改编的影片也陆续在各城市热映。不仅获得广大读者与观众的热烈反响，对我国新时期战争文学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等等，也起了有益的借鉴作用。200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央视还播出了由中围国编导、俄罗斯演员演出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鲍·瓦西里耶夫2013年3月11日病故。据说他将与妻子合葬在莫斯科西北部的瓦甘科沃公墓。他生性腼腆，不喜张扬，不少人对他的名字或许还很陌生，但人们会记住他的作品，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一个个年轻女兵的形象，仍会真实、鲜活地活在人们记忆中……

同姓小伙卞润华即将赴美深造，这位复旦数学系的毕业生，选择的却是东亚研究，行前专程来京，一心想拜见王蒙——我帮他圆了这个梦。

那天，王蒙正在屋里整理书报，玄关、客厅到处堆得乱七八糟，几无插脚之地。

宾主勉强在客厅里落座，大概是乍见大人物，润华有点笨口拙舌，手足无措，王蒙主动问了他的姓名、毕业院校、专业，瞬间笑逐颜开：啊！你是学数学的，数学这玩意儿太美了！我打小就特迷数学，这话跟你说就见笑了，因为我只有初中学历，不过，我的的确确喜欢数学。一次在澳门，听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讲数学，我就下决心，多咱也做个与数学有关的报告，比如说，数学与人生、数学与文学。

润华立刻找了话题，舌头也变得利索起来，于是，这一老一少，从数学悖论谈到人生悖论，从对称之美谈到和谐之美，从“零”谈到老子的“无”，从无穷大谈到终极关怀……

到美国留学，英文是前提。王蒙对润华说：我也喜欢英语，但小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种条件，我在初中学了点ABC，然后参加革命，没时间学，六七十年代，我到了新疆，实用主义，学会了讲维语，80年代，回到北京之后，才抓紧自学英语。我胆大，张口就讲。我女儿知道我底细，有次出门，她特地嘱咐：爸，你在外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讲数学和英文。她怕我丢丑。一次到英国开会，我用英文致辞。我一个外孙听了，说：姥爷，您英语就小水平。哈哈，小家伙在英国待过多年，他瞧不起我……

王蒙大笑，我和润华也不禁莞尔。

不管干哪一行，身体是最重要的本钱。王蒙问润华热爱哪种运动，润华回答：游泳。这下又搔着了王蒙的痒处，他讲从小就迷恋游泳，这是他那曾经留学德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北大与季羡林比邻而居的父亲，教会他的最好的一项运动。游了大半辈子，水平却不咋地，一次在北戴河下海，他小孙子在岸上看了，给他总结：爷爷，我琢磨半天，您这姿势应该叫“原地游泳”。怎么是原地，我不是从这头游到了那头吗？小孙子说：那是风的吹的，顺带是海浪推的，您自己原地没动。

润华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我一旁静听，暗暗佩服王蒙的本事，他在顷刻之间，就和晚辈小子打成一片，从互不相识变成零距离。谈话中间，王蒙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向我，我懂得这是领导的艺术，毕竟机会难得，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抛出一些平常阅读中积累的疑难。

“您最早引起轰动的那篇小说，题目究竟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问。王蒙答：“前一个是原稿写的，后一个是在发表时刊物改的，以后的介绍或评论，常常把两个题目混用。”

“您稿子写好后，一般改几遍？”之所以这么问，是觉得他的一些文章有粗糙拉杂之嫌。王蒙说：“一般改两遍，具体章节，常常是反复改，直到满意为止。”

“您喜欢使用排山倒海层峦叠嶂信马由缰一泻千里的叙述，您是故意那般打造的吧？”说话时，我想到了他那篇《来劲》，如果出自自我手——我相信自己也能写得出——刊物多半不予理睬。

“也不是故意。”他说，“我是苦于怎样说得更透，譬如说排比，我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通过错位、杂交、拼贴，烘托出各种复杂的背景、情绪。”

“您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海的梦》，在我看来，只要改动一下人称，把主人公由‘他’改成‘我’，就是一篇散文。”其实不光《海的梦》，他上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多数都给我这个印象。

“嗯，”他没有反对，接着说，“那篇《海的梦》，严文井看后很激动。”

王蒙很忙，他的写作量很大，光这两年，他送我的书就有《庄子的快活》《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一辈子的活法》《天机中国》，最近又出版了70万字的长篇《这边风景》，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说到两天要去香港，和白先勇在凤凰卫视有一个对话，然后去广州，紧跟着去佛山南海康有为的老家，再然后是杭州，杭州之后是武汉，武汉之后是新疆，他在那里生活过16年，他曾经劳动过6年的地方——伊犁，要给他搞一个“王蒙书屋”。说到劳动和书屋，王蒙来了精神，他讲：“在汉语里面，我最喜爱最天真地为之得意的一个词就叫做‘活儿’。说到底，咱们作家也是个匠人，是练活儿的。你得能拿出一手活儿来。拿不出活儿来，靠边吧，您。练出活儿，比掌了大权发了大财受了大恩德更高兴，因为咱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手段，而是手里出来的活儿！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能练心情善，有活儿道路宽！”

## ■ 阅读

## 图书馆的故事

### 眉睫

我曾自命为读书的种子。这种略略带有自恋情结的自我确认，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当年12月30日，我从黄梅一中理科班转入文科班。自此，开始了我10年的从文历程。其实，早在那年元旦，我就在我的习作本上写着：“从今日起，我要做一名作家。”现在，这个本子应该还在黄梅祖宅的书箱里吧。然而，作家梦是早就破灭了，从文却真的。

2001年，我还在读高一，经常在课间十分钟后跑到学校的图书馆，从教室跑到图书馆，一个来回要四五分钟，供我选书的时间其紧迫程度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时学校有一个近乎“变态”的规定：上课期间，包括可以自由活动的体育课也不能借书。至于图书馆管理员下班时间，肯定也不能借书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苛刻条件，我的理解只有一个——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中学其实是不鼓励学生留恋于图书馆的。即便在课间十分钟，我去借书，还经常被管理员挡回去，她们说：“这些书是借给教师的，学生不能借！”或者又说：“课间不能借书”。只是，那时幼稚得很，居然会顶撞几句：“既然是老师借的，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办证！”“课间不能借，难道上课来借不成？”

或许由于我太爱书了，管理员有时实在拦不住，可能也有些“怜惜”我了，一位阿姨感叹地说：“这个孩子真爱书！让他借一本吧！”就这样，我在高一那年，很是借了几本书来读，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其芳散文选集》。每每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便拿出枕下书，酣读起来。久而久之，一个近于同

好的室友，每见我走进寝室，便笑着喊一声“何其芳也！”于是，众人皆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想读这本书，于是借给了他——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到了高二，图书馆便要求只还不借，至于高三，更不消说了。

终于熬到了大学，学校没有读书的风气，但图书馆、阅览室总不会阻拦你的。我才真正开始了我的“酣读时代”。可惜的是，学校图书馆毫无历史可言，图书的质量不高，只好到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让同学帮我借书。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惊叹于图书馆的伟大——没有图书馆，学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几乎不可想象。

我很感谢大学时代的图书馆，是它给了我研究资料的基础，是它给了我阅读报刊的机会，甚至是它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环境。我已经不得有多少文章是在阅览室完成的，所以它也曾是我写作的“摇篮”。我整个的大学生命似乎有一半以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与其说我是进了大学，不如说我是进了图书馆。

记得上大三的时候，一个初冬之夜，接到作家、散文家张雨生老师的电话。他带着叮嘱口吻对我说：“有空闲一定要多到图书馆、阅览室啊！毕业了，就没这个机会了……”7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是不幸被言中的。这位老人，已是脑溢血重患者，神智已经不清了，而这句话总是回响在我的耳际，不由得使我深深向往那段在母校的阅读时光。

毕业后，渐渐远离图书馆，而自己的藏书也越来越多了，终于还是不能满足自己，于是办了湖北省图书馆的借阅证，只是太远，去一次不容易，还书也不易。这时，愈加想念大学的图书馆了。

大学毕业4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才发现单位离国家图书馆很近，毫不犹豫地立即办了借阅证。很快摸熟了各室的位置，能够轻松地见到港台书、民国图书、缩微文献……这时，国家图书馆又全面“刷新”了我对图书馆的认识，它是面向所有中国公民的，每个人都可能享受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遗产。它是神圣的，又是亲近大众的……



塔克拉玛干小村(油画) 艾力·牙合甫 作

原上草

第194期

被缓慢打开的，是写给心上的那个人的，一字一句，包括标点符号，都是火辣大胆的——  
哪个花园有你这样美丽的一朵花？  
引来我这样如痴如醉的百灵鸟？  
春天啊，你让我想起了自由和天堂！  
心上人的怀抱里有着我千百个天堂！  
她平静的心湖呀，为什么像被人投入了一颗石头？  
一如这时刻的少女，高挑、火辣，浑身燃烧着逼人的妖娆红，逼人的一团香，哪怕看一眼，我就彻夜难眠了。  
也就在一瞬间，我远远看见，美丽的喀什姑娘在微笑，在大笑，好像在呼喊着什么，盼望着什么……啊，悠悠的沙塔尔、都塔尔、热瓦普、艾捷克的乐声从天而降，天籁般在流淌，她没有放缓她的奔跑的速度，她从内到外放射出不可抑制的激情、兴奋、喜悦、感动，我的热情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她激活。在距离车子五六百米远的时候，她突然在奔跑中张开了自己的双臂，就像一只大大的鹰，翅膀张扬着两三米的面积，直直地朝我们扑过来，香喷喷地朝我们扑过来，不管不顾、不讲道理、不可救药地扑过来，震撼，手脚无措。  
猛的，车加速。  
她也在加速。  
也就几秒钟，我美丽的喀什姑娘大笑着，呼喊着，在奔跑中双臂一路张开，保持了一种鹰类飞翔着的姿态，大胆、火辣、坚定、固执，朝我飞奔着。这个时间，是属于大地上情歌飞扬的时间，是属于阿曼尼沙汗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像车一样奔跑，她像鹰一样奔跑，为了某一首十二木卡姆的情诗而奔跑。  
“啪”一下，她就跑过去了，转瞬即逝，闪电似的，说没就没了。我不想回头看，也不敢回头去看，我美丽的喀什姑娘，写情诗的少女，心版上正一刀一刀雕刻着她呢。如果说，一个新疆男人因为一个女人活着，那么他肯定会唱情歌；如果说，一首400多年前的情歌能够唤回你的心上人，那么它肯定被南疆放牧的姑娘清唱过。记住这个中午吧，记住这个奔跑着的姿势。  
车到机场，这幅画面仍旧在脑海里反复播放：静寂的中午，我美丽的喀什姑娘，在奔跑中张开了双臂……

## 土地与生长 张开双臂的喀什姑娘

□ 蒋建伟

南疆的大漠戈壁公路上，有接近3000米的高海拔，绵延起来，像一首诗。太阳挂在半空中，假的热，随便躲一躲，皮肤异常冰凉，外地人要提防的是帕米尔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一不留神，人就晒黑了。几天的旅行下来，不管谁的脸、胳膊，都是黑黝黝一片，再不离开喀什，恐怕都要晒成黑人了。可是一旦真的要离开，所有香喷喷的羊肉味和烤馕味、迷人的十二木卡姆音乐、扯直了笑声的维吾尔族铁匠和被太阳烤熟了的古城建筑、骡马驴子的土腥气，混杂在一起的滋味，恍如厮守多年的恋人马上要分离，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喀什就是一团冰火焰，晒化之后，变成了一条妖娆红的克孜勒河。午餐时，我举起了大串羊肉，想跟喀什的友人碰碰肉，以肉代酒，答谢答谢，竟惹来了举座大笑。我对他们说“喀什美呀”，他们答“那就在这儿买房子，想看到何时就何时”；问“有什么好看的呀”，答“你只看了喀什的几条老街、几头驴子、几个姑娘，还有好多的老街驴子姑娘正排着长队，等你检阅呢”！顿时，西部汉子的笑声、吃相、招摇，还有大丈夫一拍胸脯的江湖气，全都感染给了我。最后，两手一捧碗，一个字：“喝！”很快，红色的克孜勒河在我的肺腑里奔跑，老艺人的歌声在高天上盘旋，众声喧哗下，歌声指引着一个人走在天山大漠，犹如万能的真主在指引，遇见了她。

车子如子弹一般朝机场射去，热闹的巴扎跑过去了，穆斯林风格建筑跑过去了，高台民居跑过去了，千年老街跑过去了，一切一切，都成为了我和车后这个西域古城的身后故事。我在疾驶的颠簸中昏昏欲睡，伤感和酒精一起催眠，感觉在天空飘呀飘呀，无边无际。时间成了多余的物件。

小小的一个颠簸，竟然迷迷糊糊地醒了。车窗外，